

简述古代汾阳

社会经商传统的形成和延续

□ 王仲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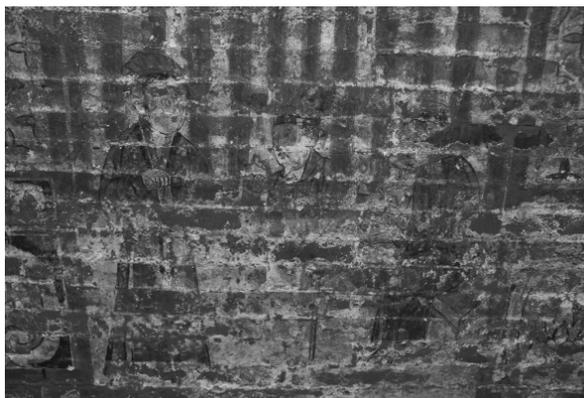
2008年,山西省汾阳市在建设汾阳至孝义的一级公路时发现了一批墓葬。墓葬位于汾阳城南10里东龙观村西北。其中一座墓主人为王立的金代墓葬内的壁画有男女两人隔窗栏进行某种交易的场景,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基本确定为中国最前卫的经济活动场所——早期金融机构——“交引铺”的场景(图一)。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说明至迟在金代汾阳人已经参与了中国最前卫的经济活动了,这也说明古代汾阳有着较为发达的商贸经济,这对解释晋商在中国明清和民国时期风起云涌的发展应当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提示我们有必要对古代汾阳商贸活动状态进行考察。

汾阳置县已有2600年的历史,春秋为瓜衍地,战国、两汉为兹氏县。三国至南北朝始称西河郡、西河国。唐以降至清,一直为州、府所在。北宋末至元代,置汾阳军。明清,为冀宁道治所所在。唐宋以降,一直为稍次于太原的山西中部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上,汾阳是晋中甚至包括河北、天津、北京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枢纽,有秦晋“旱码头”之说,有将近两千年历史的晋陕古道遗迹可以反映当年

物贸交流的盛况。晋陕古道应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兹氏县,是一个绵亘战国至秦汉的古老县地,此地所铸战国钱币兹氏布、兹氏半布标志着这里是一座商贸活动较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一个相对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位于现代汾阳城南20里的兹氏故城城址至今仍基本完整地保留着,2008年曾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其城垣、城壕、车马道清晰可辨(图二),让人想见七百年人流攒动,摩肩接踵的繁华。出土的玛瑙环(图三)、错金带钩、陶器上的“市”、“亭”等文字,再现当年商贾贸易的痕迹。

唐代,汾阳为汾州所在地,控领晋中盆地大片土地和人民。这里靠近太原,是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的重要根据地,全国唯一的祭奠李渊的高祖庙就在汾阳。这里也是武则天的出生地,她将汾阳众香寺的牡丹移至洛阳,形成了今日闻名世界的洛阳牡丹。这里还是唐中期著名政治家汾阳王郭子仪食封之地。唐著名诗人汾阳人宋之问定型格律诗,成律诗鼻祖,历洛州参军、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为皇室内臣。汾阳出土的唐永



图一 王立墓壁画“交引铺”场景



图二 兹氏古城城墙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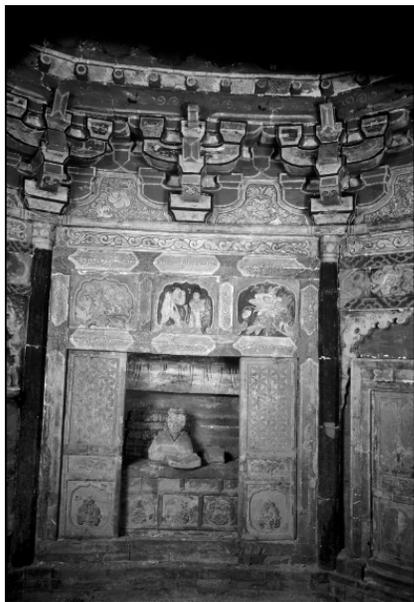
图三 兹氏古城遗址出土的玛瑙环

徽六年《曹君墓志》显示出汾阳与西亚地区民族融合的现象。这些史实可以反映出汾阳在唐王朝占有重要地位,商贸活动应当发达。

宋金时期,因汾阳一直没有遭遇大的本土战争,可以说是有一个较长时段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其时,汾阳除系汾阳军驻地外,汾州领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五县。出土于汾阳南关的宋绍圣年间赵和墓志铭载“……寓迹汾水之上,乐其人物蕃庶,井邑骈密,贸易经营,得遂其志,因而家焉……”,印证了当时汾阳的富庶。金代,目前虽未发现汾阳经济发展的直观资料,但从一些文物资料如皇统七年显庆寺铁钟、大定钟楼铁钟、《太符观创建醮坛记》碣等金石文字中,仍可窥见当时一个县域官职的齐备和人口的众多。如坊都监、酒务司监等下级官职,十分完备,职官名目似可补《金史》之缺。非常巧合的是在《太符观创建醮坛记》碣中记载的施银人中竟然也有一个叫王立的人。

1990年山西医科大汾阳学院(原吕梁高级护校)出土金墓一座,墓中一幅砖雕场景为两扇四抹头隔扇门内置一案,案后坐一人,案上置一打开的本子和砚台,人背后墙壁浮雕成串的圆钱(图四)。这则资料我们过去没有过多重视,现在重新审视认为这也是早期金融机构的场景。

近年来,汾阳出土宋金时期墓葬较多,特别是城西新城区为最,某些地域可以说是宋金墓葬的密集区。这一批墓葬中,其彩绘、砖雕墓占了很大一个比例,这不仅是一个葬俗问题,也是此一时期商贸经济发展水平的直观表现。杏花村汾



图四 山西医科大汾阳学院金墓砖雕“钱柜”

酒,历史悠久。南北朝以前已难稽考。史籍上最早记载汾酒的是《北齐书》中北齐武成帝高湛给考瑜的信,信中讲“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

这说明早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已传至宫廷成为御酒。晚唐大诗人杜牧一首《清明》诗吟出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酒自古就是商贸活动的重要媒介,而占有天下名酒的汾阳的商贸活动无疑由于汾酒的存在而发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从秦汉至宋金汾阳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经营商贸的传统,而早期金融机构的出现应当标志着这种传统的形成。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起步,晋商风起云涌,汾阳商人成为晋商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成化九年(1473年),汾州大旱,当地粮商李弘济一次拿出藏粟九十石赈济里人。明代商人王文素于嘉靖年间完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一书,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及明代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有资料表明,最早的一家账局叫详永发设在中俄贸易要冲张家口,是乾隆元年(1736年)由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白银4万两开设的。显然汾阳经营商贸的传统在明

(下转 31 页)

又浪漫的艺术风格。有学者指出,这一石窟的雕凿刀法甚至比龙门石刻还细腻,胸部和腹部肌肤的刻划,尤显清新自然,富于曲线美感,而佛衣的刻划也很有特色,不仅圆润有致,而且还把布料的柔软质地也活灵活现地刻划出来。较之隋代石窟,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都显得更加精美,也显得更加奔放。

总体而言,唐代是一个富于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时代,国富民强,欣欣向荣,这些时代特性在天龙山石窟的开凿过程中,必然有所体现。其中,第17窟就很有代表性,该石窟的后壁有3尊佛像,左右两壁各有5尊佛像,13尊佛像济济一堂,却无拥挤之感,而显壮观之象。从手法上看,其佛像丰满细腻,线条流畅,当为唐初杰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体现了唐代石刻艺术的发展趋向。

而集中反映天龙山石窟恢宏大气特色的,当属第9窟。石窟之前为漫山阁,内为三层楼阁,是1987年在明代基础上重建的。上层的弥勒坐像高达8.8米,虽有所损毁,但仍为天龙山石窟中较为完整的雕像,十分珍贵;下层为11面观音像,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分侍两旁。与我们通常所见的观音不同,这里的11面观音像是“男体女态”,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认为,这尊11面观音雕像,堪称世界之最。在佛教中,文殊菩萨主“智德”,普贤菩萨主“理德”,这一点在雕凿手法上也有精到的反映。

六、结 语

天龙山石窟起于南北朝时期,东魏大丞相高欢在天龙山修建避暑宫,开凿石窟,拉开了天龙山佛教史的序幕,后历北齐、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共有石窟造像500余尊,被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大师钱绍武先生誉为“东方雕塑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遗憾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初,天龙山石窟遭到大面积的盗毁和劫掠,不少精品被盗运国外,散失在日本和欧美等国。但就像中国文化不会断绝一样,天龙山石窟在遭受灭顶之灾后,仍然显示出它的顽强生命力。历史过去了1500多年,天龙山石窟仍以其娴熟的雕刻技巧、鲜明的地域特色、细致的表现力和丰富的生活气息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

参考文献

1. 李裕群、李钢《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哈里·斯德本·玛丽琳·赖《天龙山雕刻的复原与年代》,《敦煌研究》1995年1月。
3. 郭永安、魏国祚、常元生、江亭清《天龙山揽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李计生《天龙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

(作者工作单位:于灏,太原市天龙山文物保管所;谢枫,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上接 59 页)

清得到了继续发扬。

以上我们对古代汾阳社会古代汾阳商贸活动状态进行了简略考察。揭示了古代汾阳社会经商传统的存在和其后续的发展,但这种传统如何形成如何发展,我们没有更多材料予以论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三晋出版社。
2. 《汾上访古》,北岳文艺出版社。
3. 《汾阳金石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
4. 《汾阳金墓壁画与中国古代钱币兑换业》,《中国钱币》2011年03期。
5. 《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2期。

(作者系山西省汾阳市博物馆馆长、馆员)